

「保皇復辟」真象

· 康同環 ·

先父(康有為)晚年的政治主張

在中國近代史上，康有為是引起爭議甚多的人物，基於真理愈辯愈明之旨，本誌前曾收到黃代表啓武先生轉來康有為女公子康同環女士為父申冤所寫的本文，她對「戊戌事變」與「丁巳復辟」以另一角度提出說明，茲特連同康有為與家人合影圖照見65頁一併揭載，以供讀者參閱。

——編者

首先我須說明本題所謂，「晚年」是指從民國二年底，先父結束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國內，一直到民國十六年逝世為止。「政治主張」是指「虛君共和」，也就是一般不察事實的人所說的「保皇復辟」。我寫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那些對先父的事蹟任意譏彈，而態度頗為輕薄者，提出我的抗議。

在先父的一生中，他所懷的遠大理想，是同社會；所抱的實質目的，是實現民權；處世的態度，是捨己為人。但是他的心跡，一般人多不甚了解；尤其是晚年的表現，常為人所詬病。很少人能够詳考事實，深入觀察。多半是盲目學舌，歪曲醜化。因此，謹就我個人所知，為先父的心跡作一簡單的概說。

心跡不易為人了解

先父的心跡所以不易被人了解者，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如梁啟超所說，先父是個「先時」的人物，不是「應時」的人物。好像大隊人馬所派出的尖兵，他所發現的情況，大隊的人尚未覺

察，更說不上了解了。第二，他是懷着宗教家的熱情，如同一個天外來客的化身，專為人間掃把糠的。別人却以世間常情窺察他，自然不得要領。

當他正以己身為犧牲，獻到為國為民祈福的祭壇上時，人們在震驚之餘，還懷疑他有不可告人之心。第三，先父的心靈非常接近西方，當時對他了解較多的，反而是略通中國國情的西人，以及瀕海而居或僑居國外的華人。他的真正知音者，除了和他最為接近的「康黨」外，只有孫中山先生。孫先生與先父最談得來。先父居留日本時，孫先生常到我家吃飯，實際上是借吃飯的時間進行談話。他們初期的思想大致相同，到晚節出現了大同小異。大同者，所嚮往的都是大同社會，所求其實現的都是民主主義。小異者，先父不排滿，想建立一個有民主之實的多民族大帝國。這小異部分的思想根源是中國的春秋之義。先父以為建國之道以一統為大，華夷之分當視文化交流的程度而有其彈性。並且相信公羊家的「三世」進化之說，以為登高自卑，不能躐等。當專制的世襲之君推翻後，應代以虛有其名的世

襲之君，在安定中獲得較快的進步，以免羣雄逐鹿，造成分裂的局面。

先父的心跡表現於史冊之上的，有兩個突出的事件。一個是「戊戌變法」，一個是「丁巳復辟」。前一件事的發生，在他四十一歲的時候，足跡未出國門；後一件事的發生，在六十歲的時候，已在國外考察政治十六年，回國後又留心國事四年之久。時間上相差二十年。這兩件事，先父都是以平民身份推動的。（戊戌時名為工部主事，實未就職。）失敗之後，都成為被通緝抄家的罪魁禍首。（戊戌時被抄的有三處，一處在南海縣，一處在廣州城內，一處在廣州隔珠江與沙面相對的芳村。到民國二年時都由政府發還。丁巳時芳村的房舍又被抄，宅中的什物全失，被改為學校。後來在名義上發還了。但學校並未遷出，實際上到陳濟棠主粵時才收回。）究竟時代是進步的，後一次未殺先父的親友，又未挖掘祖墳，算是輕多了。現在，前一罪狀，早經平反，且獲得普遍的讚揚；而後一罪名，還在不自白之中。

我在光緒丁未年（民國前五年）生於瑞典，次年隨父母移居檳榔嶼，辛亥年移居日本，民國三年移居上海。到民國十六年，先父逝世，在這一段時間中，我一直和先父生活在一起，當移居上海時，我已九歲；丁巳復辟時，我已十二歲。對於當時的情形，有很深刻的記憶。我現在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將世人最不了解的「保皇復辟」的真相，就我的記憶和理解，記述下來。

「君主立憲」「虛君共和」

依我所知，先父一生的政治思想是始終一貫的。他所想的是大同社會，做的是推進民權。他的行為常是革命性的。（我國人多知「湯武革命」為革命，日本人用此詞常指一切破舊立新的事業。）在他一生中保持不斷閱讀的習慣。他讀的書多，速度又快。他經常採購新書，甚麼書都讀，純粹科學的書也讀。他個人的思想決不會停滯落後。他常留意時勢，常隨時代的進展提出不同的口號。在戊戌變法時，主張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主張虛君共和。

所謂「虛君」，便是虛設一君，只取門第，不取才能。使他只能享受禮儀上的尊崇，生活上的豪華，只做象徵性的元首，而沒有絲毫政治上的實權。如同冷廟裏的土偶，號稱為神，並無顯赫的威靈，只有迎神賽會的時候，才有一番風光。這種戲劇化的排場，並非浪費國帑，實在對國家起着很大的作用，無形中消弭了野心家「彼可取而代之」的不軌之心。國家的權力在於內閣，內閣由民主方式產生。權力的轉移，視乎民心的

向背，公民投票就可解決。縱有意外的爭執，訴諸法律，多半不致相砍相殺。縱有砍殺，多半不致動搖國本。這是歐洲各國在無數次的政權爭奪之後，付出不知多少生命財產的代價，才慢慢試驗出來，而且行之有效的成法。這個成法，有時更附上一個妙計，便是這個虛設之君，常是迎自外國異族，入籍本國而立為國君的。有一點像入贅的女婿一樣，孤立無援，不能為患。這是先父流亡十六年，環遊世界，考察政治的一個心得。這在歐洲是陳穀子爛芝麻，不值甚麼。但在中國，却是件希罕的新事，一般人還想它不通。只有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劉阿斗和諸葛亮的故事，作為權能分開的比喻，懂得的人還多一點。當時先父為民族建立為一整體的中國打算，認為維持滿人做個虛君，是最恰當不過的。只有這樣，才便於團結邊疆各民族，使遼、蒙、新疆、西藏各地，不致脫離中央而獨立，招致俄人的覬覦，釀成永無寧日的邊患。但是若不通過革命，使漢人掌握權力，想把一個專制的君主轉變為一個虛君，是辦不到的。這就是先父發動唐才常漢口起義的根源。當時海外僑胞踴躍捐輸，單是先父的好友僑居星加坡的邱菽園，一次便捐了十餘萬元作為軍餉，可見這次武裝起義是如何地振奮人心了。到了辛亥革命，清帝遜位的前後，由於漢族受壓迫過久，革命志士的民族激情特別高漲。先父知道大清必不能保，不得不順應時勢，主張立衍聖公為文宣帝，子孫世襲，作為中華帝國的虛君。這是因為衍聖公一姓傳家，綿延二千四百餘年。若把一個世襲的公爵，改為世襲君主，較有歷史上

的憑藉的緣故，可是當時能了解「虛君」為何物的，畢竟太少。儘管先父寫文章盡力宣傳它，也無他人起來附和。事實上在那時實行「虛君共和」的理想，一切條件都不具備。即使是最先進的各會各黨的革命志士，大多數不曾留心歐洲各國的政治，不了解「虛君共和」的來龍去脈。多以為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至於建立民國之後，如何團結國內各民族，如何鞏固與他國接壤的曼長邊疆，相信能考慮到這些問題的人一定不太多。況且先父所設想的「虛君」（冷廟裏的土偶），是徹底地虛有其表，完全不食人間煙火。他不是中國的劉阿斗，不等於歐洲的虛君，更不同於日本的天皇，尤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但是先父認為只有這種「虛君共和」制，最適於我國的國情，最能够使國家穩步地走上富強之道，雖然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了解，並不妨創造條件去實現它。因為民智的啓發，往往即在革命進行之中，或革命成功之後。這是要爭取時間，不能等候的。

預單詔書中的主張

當民國三年，先父住在上海以後，他的習慣只要自己在家，每天下午，便在門口掛上會客牌子，接見客人。他又喜歡到各地遊歷，接觸到的人很多。便發現有一批被時代遺棄的人物，不甘心放棄失去的特權，陰謀復興清王朝，重現舊社會。其中包括一些滿蒙的舊王公，清末新軍餘孽的北洋軍閥，以及食古不化的遜清遺老。他們多半會與先父相識，也最尊敬先父。先父想到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力，把「虛君共和」的思想灌輸

給他們，使他們轉爲己用，變爲實現自己理想的力量。但是這種移花接木的方法雖巧，却有很大的漏洞，後來也吃了這個虧。這個漏洞是：被先父說動而心服的人固然有一些，相信口服而不甚服的還是居多數，首鼠兩端投機取巧的也不少。不過，不管「虛君」也好，「實君」也好，都想把廢帝再扶起來，是這一批人的意見，終於組織了以張勳爲主帥的鬆散的同盟軍。張氏雖然是一個粗人，但比起戊戌政變時的袁世凱，總算可靠得多了。同時先父也不願陷入現實的機括裏，損及自己的理想。只憑從旁指導，功成身退。

不料到民國四年底，反動透頂的袁世凱，竟然不恤人言，出賣國家權利，以換取列強支持，要從大總統的寶座上再高升一步，於是惹起先父憤怒聲討，又發動門人徐勤率領十九隻兵艦攻粵，以與蔡鍔相呼應。先父將香港亞實律道一座三層樓的產業抵押借款二萬元，以助徐勤軍餉。那時各地討袁軍聲勢浩大，袁氏的帝制根本動搖。先父於是檢討他的「虛君共和」主張，覺得君主的名稱所含的封建毒素尚未清除。不如仿效法國的「虛總統」制，較爲適當。便提出袁氏倒臺後的善後意見，主張使當時的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爲終身任期的「虛總統」，子孫可以世襲。以「虛總統」作掩護，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這個提議，也未引致任何反應。後來，袁氏死後，黎氏雖然繼任大總統，但不是先父所說的「虛總統」。到民國六年，黎氏與段祺瑞的國務院爆發了「府院之爭」。若是如先父所說的「虛總統」，那裏還會有這一場於國於民都有不利的爭執呢？

這次「府院之爭」，加上北洋軍閥的陰謀詭計，雖打開了復辟行動的大門，却也隱伏着復辟失敗的危機。先父明知情勢複雜，但想乘機實現「虛君共和」的心太切，便繼張勳帶兵入京之後，也帶着預先起草的十餘道詔書，入京協助。不料張氏自己專管治兵，主持復辟大計的却是幾個毫無識見的幕僚，他們那裏能理會得先父的意圖。因此，先父預草的詔書中應頒佈的事項，如定國號爲中華帝國，行虛君共和制，召開國民大會，融化滿漢畛域，親貴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諱等，一概擯棄不用。反而紛紛改定名稱，如大清國、大清門、大清銀行等。這些倒行逆施，無異自取滅亡。當反復辟的羣衆怒潮湧起時，那些時令的渣滓固然被潮流席卷而去；先父的虛君共和的理想，也隨着化爲泡沫了。一般不分青紅皂白的人，把先父認爲復辟罪魁，不是別有居心，便是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其實復辟者自有其人，而不是先父。先父主張「虛君」（不是「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辟」），又主張定國號爲「中華帝國」，不是恢復舊王朝的統治，與「復辟」之名不合。我認爲還應該正名爲「反復辟」才是。至於張勳等進行復辟時，爲先父加上一個「弼德院副院長」（一種顧問性質的虛銜）的偽職，這只是在當時情勢下，從權接受的，也沒有正式拜官的禮儀。人人都知道先父的素志是「一生不入官」，他不會希罕一個甚麼副院長的，也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先父所主張的「虛君共和」，實是不折不扣的共和。雖然有一個名義上的君主，只能對共和有利，不會有害。有人斥

責先父想恢復君主制，是政治上的倒退。試問表相與實質那個重要呢？

處於夾縫失敗是實

基於上述理由，先父決不是復辟倒退的人。再看當時孫中山先生致黎元洪電，勸他把反對民國的帝制犯張勳、段祺瑞、馮國璋、梁啟超等捉起殺掉，其中並未提到先父。從無字處也可以看出一點消息，在賊營中的未必是賊，喊捉賊的可能不是賊。馬廠誓師組織「討逆軍」的段祺瑞，孫先生認定他原是帝制犯，並不冤枉，可見研究歷史是一件多麼細緻的事。

最後，我還想表達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爲先父的一生都是想用一己的影響力來改造時勢，而終於吃了形勢比人強的大虧。盡管他的影響力我們不能低估，而他的工作再遭失敗却是事實。他在戊戌變法時所處的劣勢，人所共知，不用多說。而丁巳復辟的情勢相當複雜，應該分析一下。我認爲主要的形勢是北洋軍閥間的爭權奪利。當初積極支持清帝復辟的是北洋軍閥，後來見復辟的大勢已去，又扯起偽裝反復辟大旗的，還是那一批北洋軍閥。只有先父倡「虛君共和」，不爭任何權利，却陷入這個形勢的夾縫中，胡裏胡塗頂替了一部分復辟的罪名，而偽裝的反復辟者段祺瑞、馮國璋等既贏取了英雄之名，又奪取了政治利益之實。現在「復辟」事件已過去了整整一個花甲，而這段史實的眞象還未大白於世。我希望歷史家能不爲歷史的假象所蒙蔽，而把它的面目揭露出來。

（本文插圖請參閱本期64頁）